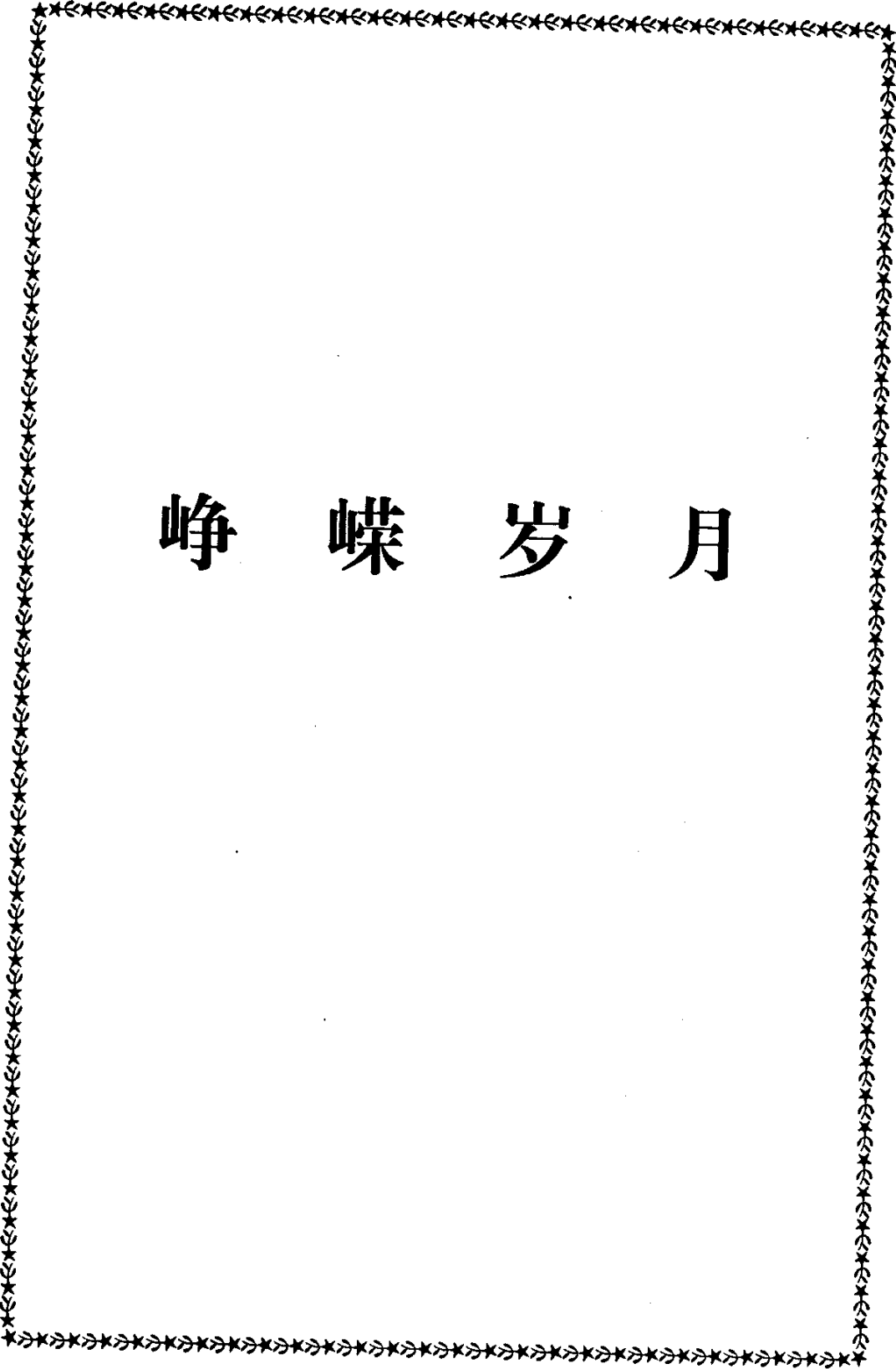




峥嵘岁月

我的外交生涯

潘正秀

一、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黄毛丫头

1937年阴历三月，我在外婆家一间简陋的厢房中降生。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尽管我是一个女孩，我的父亲潘礼顺又是外祖父杨家的入赘女婿(有的地方叫‘倒插门’女婿)，但是我的外公外婆全家极其善良朴实，我的到来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倍受宠爱。毕竟我是杨家这个大家族第三代的‘领头雁’。

我外婆家住在南京西郊水西门外雨花台区长江中一个名叫江心洲的岛上，我的幼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我的大舅杨有山是江心洲解放前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学的是法律。我的小舅杨有玉也上了中学，在当时的江心洲他们都算是文化人。因此，我的教育问题从小就受到杨氏大家庭的重视，到了入学年龄我准时上了小学，在校也算是个聪明勤奋的学生。

后来我的父母单立门户，我们家搬到外公家约二里路外的一条无名沟渠旁，这个地方过去叫‘红毛地’。解放后才正式叫‘红庄村’。1951年，我考取了南京市内的一所女子中学，那年暑假我生过一场伤寒病。这场大病，

使我在新学期开学时没能按时去学校报到。因为我喜欢读书，害怕功课拉下赶不上，我在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闹着要去上学，我的妈妈只好为我准备行装——一床厚厚的棉被及她亲手缝制的其它衣物。被面是蓝底白花的家织土布，有点象现今时髦的腊染布，这床被面我至今还把它封存在我家的阳台上，不时拿出来看看。记得我上学的那天，我的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我的铺盖卷和脸盆等杂物，面黄肌瘦的我跟在后面。确切地说，当时的我是“红毛地”里走出来的一个黄毛丫头。老师和同学们看我那个瘦小体弱、可怜兮兮的样子，都很同情我，关照我。我这个人关键时刻还是能咬牙的，那年，我的功课虽然拉下1/3，但大考成绩倒还不错，我记得各科总评得了88.8分，如果在现在人们极为青睐“8”这个数字的年代，我得了3个“8”可是大吉大利。但当时，我只是觉得分数还算高，心中暗自欣慰，对这3个“8”倒并没特别在意，更没企望这3个“8”给我带来什么特殊好运。由于我的体育、美术成绩较差，要不然各科总评成绩应该在90分以上，我爆出的这个冷门，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在初中三年中，我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1956年，高中毕业那年我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我作为解放后江心洲第一个大学生到北京上名牌大学。离开南京那天，我的父亲又用一根扁担挑着我的铺盖卷和一个大藤箱，送我到下关火车站。我记得那藤箱是我父亲花了8元钱在南京新街口中央商场买的，现在8元钱太

微不足道了,但在当时也算是我父亲对我的‘厚礼’和一笔不菲的‘投资’。在与我一起到北京上大学的那批南京学生中,看样子就我一人是农家子女,因为没有别的家长用扁担挑着行李送行的,我的行装也显得比人家都土气。

我离开江心洲到北京上学那天,我的妈妈站在江边渡口看着渡船慢慢把我带走了,她哭得好伤心,我的亲友劝她,女儿上大学了,有出息,为什么要哭啊。可是在我妈妈的心目中北京好远好远,她舍不得宝贝女儿离开她的身边。她捏着指头算,我要半年后放假才能回来。因为对我朝思暮想,我走后,妈妈大病一场。北京外院毕业后,我又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语。1962年初秋,当我结束了六年漫长的大学生活,即将踏入外交部大门时,一纸调令把我派到离太阳最近的西藏高原,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琼结筹建俘虏营,管理印度俘虏并担任译员,我的外交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尽管在文革极左思潮中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我认为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解放后从江心洲这个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我还上了两个大学,学了两种外语(英语和印地语),这是我最珍惜的一份无形的财富。是共产党让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党把我培养成才,我永远不会忘这个本。粉碎四人帮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圆了我终生追求的

政治夙愿。再者,我和我的丈夫刘新生是大学同学,在我们外交生涯的后期,能同在一个使馆当上大使和参赞,算是黄金搭档,我们也倍感幸福和满足。我们不断鞭策自己,要以勤奋努力的工作来报答党,报效祖国。

二、从长江到恒河

七十年代末期一个盛夏季节,我和我的丈夫曾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我国唐朝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地方印度去任职。我对印度这个国家心仪已久。记得 1954 年 10 月,我在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读书时,印度总理尼赫鲁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写了一篇自命题作文《欢迎你,尼赫鲁总理》。当时我是一个中学生,还谈不上纵述中印关系的古往今来,但对印度走在街上大摇大摆的大象神态及妇女身着沙丽婀娜多姿的情景作了一番非常肤浅的描写,没想到我的那篇作文竟得到我的语文老师的赏识,曾被贴在墙上供同学们观摩。更没想到的是,1958 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时,被外交部选送到“北京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偏偏在分配我们这批学生时,领导就决定让我学习印地语(印度官方语言之一)。我人生的这一转折使我从此与印度文化结了缘。除了常驻印度一干就是六年外,我在外交部内工作期间又两度“坐印度桌子”(英语说法),分管印度事务。可以说,我三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小半时间与印度打交道。

我对印度文化的兴趣包括了我对恒河的向往与敬仰。恒河是印度第一大河,印度人称她为‘圣河’、‘母亲河’。

我们夫妇在驻印度使馆工作期间曾出差到恒河之滨城市瓦拉纳西,顺道领略了恒河的壮美气势与丰采,对恒河流域一带的风土、习俗与人情作了一番实地“采风”。“印中友协”的一位名叫凯坦的先生全程陪同我们夫妇在瓦拉纳西市及周围地区参观访问了几天。

恒河两岸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谈不上美丽,但很奇特。房屋都很矮小破旧,道路狭窄,交通无序。我记忆最深的是神牛在街上徜徉,畅通无阻;大象在挤得水泄不通的闹市里大摇大摆,无人阻拦。这些被视为神灵的动物不受任何约束,当然不可避免的就要任意排泄,污染环境。该城尽管脏、乱,但却是印度古老文化的缩影,是印度教和佛教圣地,古往今来以其奇风异景,吸引着世界上不同肤色的游客和香客到此一游。

印度朋友告诉我,瓦拉纳西在印度教徒心目中是圣城,人一生中至少要去朝拜一次,如能在此“归天”,那更是死而无憾。在瓦拉纳西你遇到任何人,他(她)都会流露出对身居圣地,傍倚圣河的自豪与满足。瓦拉纳西居民说他们有四大乐趣:朝拜庙宇、观赏日出、洗圣水浴、恒河升天。在这么个区区小市镇里,竟建有2000多座风格迥异的庙宇和寺院,多数属印度教,其中最显眼的当数湿婆神金庙。不少庙宇里供奉着恒河“女神”盘坐莲花的神

像。这些寺庙有的金碧辉煌，气势恢宏；有的小巧别致，造型独特，也有的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外来香客为表示虔诚，一般都要花上三五天时间步行到主要庙宇参拜一番。

恒河日出是一独特的景观，泛舟恒河看日出，那是一番难得的异国风情。一天清晨，我们夫妇在凯坦先生的引领下，穿过恒河岸边石头台阶上黑压压一片川流不息的人群，登上停泊在岸边的小木舟，与‘印中友协’的几位朋友在船上共进早餐。我们仅应酬性地尝了一点甜食，把注意力集中在太阳将要升起的地方。终于，在万众瞩目中，霞光似锦的恒河水托起一轮红日冉冉东升，引起了一片欢呼声，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日出，多好看啊！”憨厚寡言的印度船工见我如此激动，也应和说：“多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日出啦！”从他黝黑的面庞，我看到一个普通印度劳动人民发自内心对中国人的诚挚情意。在融融友情的气氛中，我们相互洒了‘圣水’，祝愿幸福与安宁。

据神话传说，恒河是天上女神的化身，应人间某国王要求下凡冲刷其祖先的罪孽并灌溉农田。从此，人们笃信恒河水是洗涤罪过之圣水。因此，洗圣水浴就成为印度教徒每天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在瓦拉纳西，每天早晨印度教徒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恒河码头，开始一天中以洗‘圣水晨浴’为中心必不可少的宗教活动。我被岸上和河边浓烈的宗教气氛及男男女女沉缅于水中的各种洗礼动作深深吸引。大大小小的庙宇里教乐高奏，经声缭绕，

祭司们手捏念珠,口诵祷词,人们一派繁忙。狭窄的甬道挤得水泄不通,小贩们的地摊连成一片,竞相出售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成群的理发师席地而坐,为即将洗‘圣水浴’的人们修整发饰。排列成行的乞丐,其中不乏缺胳膊少腿的麻疯病人,争先抚摸行人的脚尖,甚至抱着行人的腿不放,苦苦哀求洗‘圣水浴’的善男信女施善行好,我们作为‘老外’也不能幸免。此时,我既担惊受怕,同时内心也有几分同情与怜悯。记得有一次遇到这种尴尬场面,我情不自禁地摸摸裤兜,想掏出零钱安抚一下这些不幸的生灵,可是,站在一旁的凯坦先生急忙把我拉开,他说这种情况下,你如给钱,会被三五十个人围住。我只好控制住自己的怜悯心。

我们乘坐的小木舟在恒河中划破层层碧浪,缓缓逆流而上,各种人在水中的洗礼动作一一映入眼帘。男人们都是赤膊上阵,下身穿一条短裤,或围一条布巾,站在水中。其中有人双手抱头,一头扎入水中,喝上一两口‘圣水’又钻出水面,如此反复多次。当时我想,一场晨浴后,这些恒河信徒们准是灌满一肚子‘圣水’。沐浴过后,他们面向朝阳,作一瑜珈姿势,或盘坐水边,双手合十,闭目祈祷。女人们有的蹲在岸边漂放花灯,奉祀河神,有的和衣浸入水中,撩起沙丽的一角轻轻擦去身上的污秽。沐浴完毕,她们到岸边水亭里更衣,然后提上一壶恒河‘圣水’,婷婷移步,缓缓离去。儿童们除模拟成人做些敬神动作外,总不免击水嬉闹。但成千上万的成人中,没有一

个人欢声笑语或聊天，也许因为这是一场神圣的宗教活动吧！恒河晨浴算是恒河的重要一景，而在恒河刷牙也是晨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奇怪的是，这里的印度人刷牙不用牙刷，不用漱口杯，而用两手捧水吸到口中，有的用手指来回在口中搓，有的用树枝在牙齿上蹭。据说，这种树枝还不是一般的树枝，我曾向朋友要了一根，放口中尝试了一下，发觉这种树枝的味道苦中还透着几分甘甜。更不可理解的是，恒河边的印度人刷牙漱口后的水不吐掉，而是喝下去。我想可能是不愿把点滴“圣水”浪费了吧！

恒河岸边又是印度教徒圣洁的火葬场。印度人认为，凡是死在瓦拉纳西，又在此火化后骨灰撒到恒河中的亡灵，可径升天堂，免受轮回之苦。这就是瓦拉纳西这么个区区小镇，人口如此密集的原因。一些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的人，孝子贤孙们干脆就早早把他们送到恒河岸边等死。也有不少尚无至命之疾，甚至身子骨还挺硬朗，囊中不算羞涩的老者，自己就跑到恒河岸边租间小屋或住在旅馆，静待寿终之日来临。当然，为数众多家境不济的穷苦老人，要圆死(在恒河边)梦，只好栖宿在小道、破屋和河边石阶旁。据说，如死在恒河岸边，身边无家人的死者，政府帮助收尸，并免收火化费用。有几次我问印度朋友：“这些身边没有亲人的老人死了，被政府火葬场免费火化了，他们的子女怎么知道这些亡灵下落何处呢？”他们好象觉得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几分稚气，因此没有人

认真作答。有的干脆就敷衍我说：“咳，能死在恒河边比什么都重要。”

不少装着不同档次木材（有钱人一般用檀香木焚尸）的船只停靠在岸边，待死者家属选用焚尸木材。船边停放着用五颜六色花布包着的尸体。我曾看到好几拨男子抬着一具具尸体逐个放在架好的木柴堆上。葬礼仪式开始，一名祭司做完祷告后，点燃柴堆，火葬场的工人往尸体上浇一种带有香料的油脂。可想而知，烧焦的尸体味加上燃烧的木材味和香料油脂味混为一体，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异味！我身旁的印度朋友对此习以为常，他们照样谈笑风生，但我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感觉难以言状，这也是我不能与印度朋友一起在恒河上进餐的主要原因，但我不能明说。从理性上，我还是为这些亡灵能在圣洁的恒河之滨‘魂归天堂’而高兴。这毕竟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啊！回到使馆后，甚至在我离开印度后，我还经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既能尊重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同时又对恒河进行必要的疏浚和净化，对周围环境进行一些治理，否则‘圣河’之‘圣洁’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我想，我的担心是出自一个既热爱自己的母亲河长江，又痴情于恒河文明的人。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每天排入恒河的工业废水有 9 亿升，这还不包括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在河中洗浴排污，死后又把骨灰撒在恒河内。还有的印度人害怕把骨灰撒入恒河会与别人的骨灰掺和到一起，到了天

国，自己的五脏六腑与别人纠缠不清，不能转世。因此，把全尸推入恒河，任其漂流，加上水中一些大象神牛腐烂的躯体。我认为这些动物残骸是对恒河流域空气及水质污染之最。

入夜，我们再度来到恒河边。夜幕下的恒河别有一番景象 沐浴和敬香的人们都已离去，只见岸边焚尸柴堆余烬不灭，忽明忽暗，远远望去，犹如秋夜几星萤火。女人们敬奉河神的花灯，随着粼粼碧波漂浮，恍若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岸边金碧辉煌的庙宇，倒映在皎月照耀下的河水中，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

恒河，我慕名而去，惬意而归。你迷人的丰姿和独特的恒河文化，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三、亲历菲律宾五次军变

1986年2月，菲律宾人民奋起发动“二月革命”，把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独裁政权赶下台，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登上总统宝座。此后不久，我们夫妇相继被派往这个当时亚洲的“热点”国家，也是世界舆论关注的地区任职。我和我的丈夫都分配在使馆调研室工作。我丈夫任该室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算是“夫唱妇随”。我们每天阅读大量当地报刊、撰写电报文稿，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形势紧张时，前往出事地点了解实情，同其他国家驻菲律宾使馆的同行交流信息，向国内报告有关事件的前因后果，忙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

十分繁忙和充实。

1986年至1989年,我们在菲律宾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前后经历了5次军变,其中以1987年8月28日第五次军变(又称‘8·28’军变)最甚,其来势之猛,战斗之烈,伤亡之重,差一点让刚刚诞生的阿基诺新政权夭折。因为曾经身临其境,这次军变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了。一个国家在两三年时间里连续发生5次军变是罕见的,而作为一名外交官,特别是女外交官在驻外工作期间碰上5次军变,看到一些实景,我想也为数不多。我把这段时间的见闻当作我人生道路,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段可贵而又不可多得的经历,至今仍回味无穷。

1987年8月28日凌晨2点,一位朋友给我丈夫打来电话说:“军人又闹事了!”我丈夫接完电话后立即向使馆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根据使馆领导的指示,我们夫妇同办公室主任一起驱车前往总统府,进行“实地考察”。到了现场,只见总统府四周一片漆黑,通往总统府大门那条马路口除了几个行人外,十分冷清。当我们驱车靠近总统府时,被躲在暗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挡驾,不让前进。我们就站在原地不动,好在从远处也能把当时的情形看个大概。此时,总统府周围已布满士兵,旁边还停放着好几辆坦克。突然,我丈夫发现,国内新华社和文汇报派驻马尼拉的两名记者已捷足先登,在那里进行阵地采访。在这种场合看到有自己的战友在附近,倍受鼓舞,心里好象踏实多了。而且他们是记者,行动比我们身为外交官

的人方便多了,因此,他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实况。

临近中午,约 1000 多名军变士兵集中攻打离总统府约 10 公里的阿吉纳尔多军营,并夺占了这座国家军队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大本营。这个军营离我们使馆不远,事发后,我们到军营附近观察了一下形势,只见军营的围墙被炮火轰塌了好几段,营内建筑物布满蜂窝似的枪眼。叛军据守在总参谋部大楼内。这时,军变首领霍纳桑上校开始在阿吉纳尔多军营露面。与此同时,军变部队还攻占了多处战略和通讯要地——维拉莫空军基地、电视台和电台,并抢占了一家旅馆作为叛军临时指挥所。菲律宾官方新闻媒介此时基本瘫痪。叛军掌握了电台还在广播消息,我们抱着收音机收听,听到一名女广播员用低沉的声音在那里播报:……全国至少有 6 个省的驻军向叛军倒戈,菲律宾军事学院的 800 多名学生也表示支持军变。在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务,叛军占领了机场、省市政府大楼,并软禁了省长、市长……。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军变好象很快要“大功告成”。其他消息几乎中断。我丈夫很着急,急忙与一些西方外交官取得联系,他们倒是提供了一些可贵的信息,当时形势确实十分危急。

军变的枪声打响以后,阿基诺总统非常震惊,下午 2 时 30 分,她出现在政府控制下的 7 号电视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劝告军变士兵向政府投降,并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政府军将用军事手段严惩叛军。下午 5 时,一场平叛战斗打响了。两营海军陆战队和步兵,在飞机、大

炮、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踞守在国防部军营的叛军发动猛烈的‘立体式’攻击。政府军官兵右背上都绑着一块红布作为标记。激烈的炮火使附近的建筑物为之震动。叛军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政府军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好在7号电视台还在政府军控制之下。因此,我们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数架老式轰炸机,向困守在总参谋部大楼的叛军投下数枚炸弹,并连续发射了空对地火箭。顿时,大楼陷入一片火海,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黄昏前,政府军终于重新夺回这座军事指挥系统中枢,取得了平叛战斗的决定性胜利。

局势稍稍平定后,一直守在军营外面采访的记者被允许自由进入阿吉纳尔多军营。当时,我们夫妇与两名中国记者也一同前往‘参观’。只见总参谋部大楼已被夷为废墟,断垣残壁上,弹痕累累,木制家具仍在燃烧,发出焦糊味。烧毁的文件柜以及子弹壳、食品盒比比皆是,一片狼籍。当晚,我又与调研室另一位同事被派往仍在叛军占领下的一家菲律宾电视台附近了解情况,那里对峙状况不甚激烈,这可能也是使馆领导把我一个女同志派去的考虑。我们从一个比较隐蔽的角度,看到现场叛军占领着电视台,居高临下,政府军荷枪实弹包围了电视台,双方虽处于两军对峙状态,但关系不算紧张,政府军有的士兵还嬉皮笑脸地与叛军互相搭讪,有的互递香烟和香蕉等食品。我对这种场面感到不可思议,按照我的思维逻辑,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垒,应该敌我分明,如果在

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军士兵一定要受到处罚的。当时我把我内心的疑团对同行的一位同事说了，那位同事好象没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轻描淡写地说：“咳，菲律宾人性格就是这样。”

从全局来看，第五次军变是菲律宾几次军变中最激烈的。据官方宣布，激战双方共有 50 余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1000 多名官兵参与了军变。那座被炸毁的大楼将作为阿基诺总统执政时期粉碎几次军事政变的历史见证，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那次军变平息后，菲律宾报界还在连续报道“8·28”军变始末与内情。据报道，那天上午 11 时，政府军对盘踞在阿吉纳尔多军营的叛军发起进攻，当时美国驻菲律宾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列维·拉菲尔身着便衣在现场进行干预，他说，大家都是同胞兄弟，何必自相残杀？企图阻止政府军的进攻。拉菲尔的露骨干涉在遭到政府军的现场指挥官的拒绝之后，他又游说其他军官，要他们停止进攻，但均未奏效。此消息见诸报端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阿基诺总统亲自下令外交部和国防部分头进行调查。经过一系列折冲，菲律宾政府与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玛科斯特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普拉特终于达成谅解和让步，由美方将拉菲尔中校调回国。这位中校成了菲律宾第一个不受欢迎的美国武官。其实，美国使馆插手“8·28”军变的外交官何止拉菲尔一人？军变那天凌晨，美国使馆陆军少校丹·福勒也闯入闹事的维拉莫空军基

地,在混乱中他的汽车遭到袭击,多亏车上装有特殊安全装置,他才幸免一死。同一天,美国使馆陆军武官史佩里一直呆在政府军临时指挥部克拉梅军营内进行活动。有报道说,当政府军傍晚向军变官兵发起进攻后,一架从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起飞的直升飞机把被围困的几名军变军官接走,致使他们长期逍遥法外。可见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菲律宾内政干涉之深。

回顾 1986 年 2 月,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当上总统后,菲律宾局势跌宕起伏,事端不断。仅头 3 年,就先后发生了 5 次军事政变,而且军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摆在一位家庭妇女出身的女总统面前,形势是何等的险恶?! 到菲律宾任职前,我曾在印度工作,我对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崇拜不已,当时世界舆论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铁娘子’,而英·甘地比撒切尔还硬,因此印度媒体誉她为‘钢娘子’。可是到了菲律宾,我发现阿基诺夫人比起前两位女强人,其坚强与刚毅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聪明干练,临危不惧,冷静果断,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平息了 5 次军变,保住了新生政权。她外柔内刚、虚怀若谷,不断在现实斗争中增强治理国家的能力,迅速完成了从一个大家闺秀、贤妻良母到一位成熟女政治家,巾帼领袖的转变。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仓皇出走,给国家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阿基诺夫人上台后遇到的难题太多,她不仅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反而屈服于军方压力,对

策动和参与军变的官兵采用姑息迁就的怀柔政策，“虽过五关，未斩一将”。前3次军变发生后，政府对参加军变的官兵未采取任何法纪制裁措施，只是每个人做40下俯卧撑；象征性‘惩罚’了事，甚至还为这些官兵增加军饷或提升军衔，难怪有人讥讽说，这是‘造反有理’。第4次和第5次军变平息后，政府将叛军集中到停泊于风景优美的马尼拉湾的一艘船上‘关’了一个月，明为‘关押’，实为“有吃有喝”的‘水上渡假’，而且警戒非常松懈，以至军变头目霍纳桑从船上逃跑，长期逍遥法外。至于，多次军变的策划者与参与者恩里莱除了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也没有人再敢动他一根毫毛，其结果必然使有野心的军人和政客得寸进尺。这就是菲律宾的政局和政治的奇特之处。

四、觐见文莱国王后与王妃

按照文莱惯例，新任大使到文莱向苏丹陛下呈递国书后，新任大使夫人要分别觐见王后与王妃，这项礼仪在别的国家不多见。

1993年10月，我的丈夫被任命为首任常驻文莱达鲁萨兰国大使，1994年1月10日呈递国书。1994年4月20日，即我到达文莱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接到文莱外交部通知，当日下午，文莱王后要在王宫接见我。得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到文莱，使馆就向文莱外交部递交了我要求觐见王后与王妃的照会。两三周后，